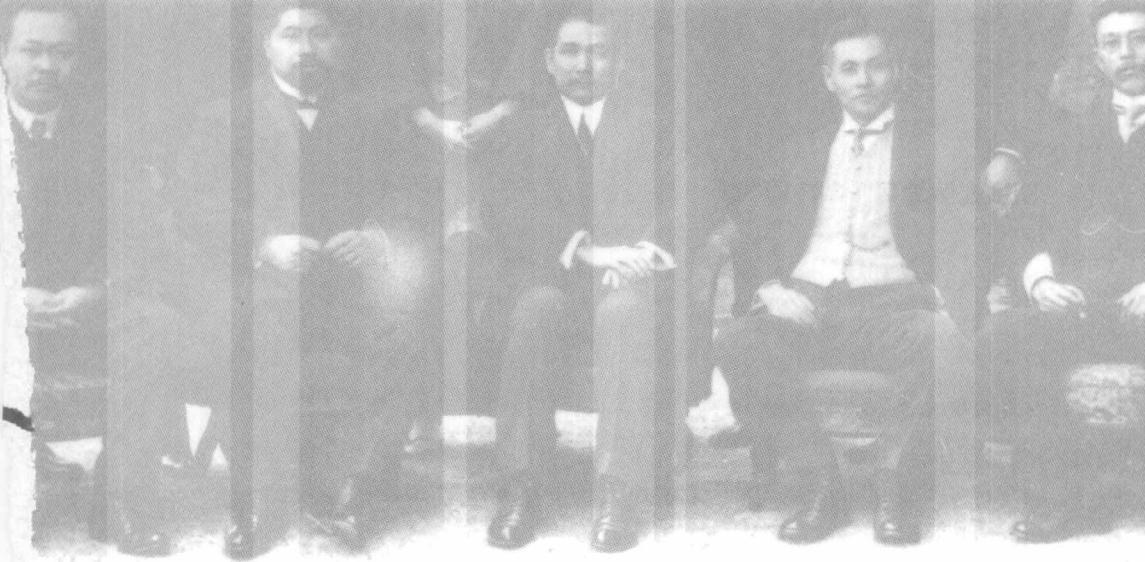


# 民國人物 速速看

叶观澜 著



民國人物  
速速看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人物连连看 / 叶观澜著。  
—上海 : 文汇出版社, 2010.9

ISBN 978-7-80741-985-3

I . ①民… II . ①叶… III . ①历史人物 - 生平事迹 - 中国 - 民国  
IV . ① K82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55544 号

民国人物连连看

作者 / 叶观澜  
策划 / 么志龙  
责任编辑 / 竦振榕  
装帧设计 / 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** 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销 /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刷装订 / 三河明辉印务有限公司  
版次 /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 
印次 /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本 / 720 × 1000 1/16  
字数 / 200 千字  
印张 / 16.5  
书号 / ISBN 978-7-80741-985-3  
定价 / 28.50 元

# 自序

民国时代，肇始于 1912 年 1 月 1 日。这一天，孙中山在混沌动荡中就任临时大总统，正式下令定国号为“中华民国”。从此，民国时代开始了。此后，帝制共和几经反复，独裁民主相互角力，直至三十八年后“蒋记民国”倒台，大陆版的民国时代便匆匆结束了。

真可谓，骤然而来，骤然而逝。

然而，在这短短 38 年里，民国却涌现了一批响当当的人物。

这批人物，有的起自草莽，有的源于旧朝，更多的自然是新潮派。出身各异，职业不同，尽管都挤在同一面“推翻帝制，缔造共和”的革命大旗下，嘴上大声说着新潮时尚的词，然而，很多人的心底终究怀着中原逐鹿问鼎天下的旧梦。

于是，适才诅咒帝制的人，转身坐上了龙椅！昨日大骂军阀者，眨眼又成了军阀！

就连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也不能完全免俗，倡言人权，却要廖仲恺等革命党人，按手印宣誓将其个人性命完全交付给自己，一起去干中国的民主事业。

英雄乎？奸雄乎？抑或枭雄耶？

王道乎？霸道乎？抑或无道也！

民国那些人物就这样纷纷登场扮演着各自的角色。

他们或结群为党，或三两为友。结党者未必能同仇敌忾，为友者自然不

能全都终保友谊。

为友为仇，全看当时社会的情势。

当然，无论身为同志最后分道扬镳，还是先为朋友最终割袍断义，都在民国春秋里留下条条清晰可见的人际脉络。

顺着这一条条人际脉络，我们便可 在纷乱糊涂中找到一个不糊涂的民国。

于是，便有了这本书的诞生。

叶观澜

2007年2月15日于一止斋

# 目 录

## 王闿运与杨度

——帝王术误两高才 ..... 1

## 梁士诒与杨度

——同幕争宠忙与闲 ..... 19

## 朱启钤与雍剑秋

——交通系大佬与军火贩子 ..... 38

## 吴长庆与袁世凯

——敦厚成全一枭雄 ..... 53

## 宋教仁与赵秉钧

——政治书生与特务政客 ..... 65

## 章太炎与袁世凯

——书生政客难相与 ..... 89

## 梁启超与章太炎

——民初论政两枝笔 ..... 102

章太炎与孙中山 ——分合不定两“冤家”	118
陶成章与孙中山 ——时起纷争同盟者	132
陈其美与陶成章 ——同一阵营两政敌	145
陈其采与陈其美 ——携手前行两兄弟	155
陈其美与蒋介石 ——相互成全两要人	171
陈布雷与邵力子 ——文士好友道不同	181
何应钦与陈诚 ——共奉一人两对头	215
马君武与张学良 ——半世纠缠一首诗	241

## 王闿运与杨度

### ——帝王术误两高才

文士相轻，是中国读书人沿袭千年的传统。对于同时代者，无论其人辈份多高，名声多大，地位多显赫，鼻孔朝天的章太炎一般是不拿正眼相瞧的，譬如有人问他对梁启超文章的看法，他竟毫不客气地说，无一字可以入史！再问吴稚晖之文如何，章更是以语无伦次来形容。

但若章氏这般睥睨天下者，却独服一人，那便是三湘名士王闿运。

王闿运何许人也，居然能折服此老？

王闿运，字壬秋，又字壬父，号湘绮，1833年生于善化（今长沙），逝于1916年，祖籍湖南湘潭，是晚清名重一时的大教育家、史学家和经学家。王家祖上本是湘潭名医，读书科考，博取功名的正统观念渗透王氏家族血脉，可谓根深蒂固。奈何其父读书不成，转而赴善化经商，一腔热血便转寄在小壬秋的身上。不想壬秋幼时笨拙，无心课读，成天耽于儿童嬉戏，乃父大为苦恼，不久竟因操劳



王闿运，字壬秋，号湘绮，潜心研究“帝王术”，可是这门“学问”非但误己，还连带祸害了他的高徒杨度。

王氏年少才大，心气颇高，自然不甘于此，于是便独辟蹊径，潜心研究起“帝王学”来，企图以此来打通富贵之门。岂料终老一生，非但已身为此所误，还连带祸害了自己的高徒——被袁世凯称为“旷世逸才”的杨度。

“帝王学”，简而言之便是物色、选择、拥戴、辅佐“非常之人”，设计并运用非常之谋略，助之成就帝王事业的学问。说是“学问”，其实无非教人押宝强梁，乘乱趋势，但问目的，不计手段。总之，阴谋于密室，逞强于时势，重术而轻德。所以历代士林正派人物都不屑于此道，将斥之为“帝王术”，认为它是有“术”无“学”。

“帝王术”承继法家法、术、势思想，参合兵家三十六计，于诸子百家学问中各择一二实用者，掺杂打造成一门独特暗器。中国历史上的苏秦、张仪等一班纵横家，都是玩弄此道的高手。他们穿梭于各国，纵横捭阖，依违两端，以三寸不烂之舌，时而鼓秦斗赵，时而说燕离齐，合纵连横交替并用，目的就在于通过把自己辅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宝座，来成就他们个

过度辞世而去。好在叔父不弃，访得严师督教。一日，壬秋背书错误百出，遭塾师重责，一顿竹板之后，其师痛切陈词：“大户子弟，无心向学，则光宗耀祖何可得乎？岂不有愧于列祖列宗？”接着又是一番鼓励：“学而蚩于人，是可羞也，蚩于人而不奋，毋宁已。”壬秋顿悟，自此心智大开，醉心于学，进步迅猛，成绩斐然：9岁熟读五经，14岁“文翰翩翩”，闻名乡梓，19岁县试中第一名，24岁参加长沙乡试中举人。

不过好运到此为止，此后王氏数次参加会试均未中。

王氏年少才大，心气颇高，自然不甘于此，于是便独辟蹊径，潜心研究起“帝王学”来，企图以此来打通富贵之门。岂料终老一生，非但已身为此所误，还连带祸害了自己的高徒——被袁世凯称为“旷世逸才”的杨度。

人的现实功业，谋取自家的富贵。

这些人说白了就是一群魑魅魍魉的无耻文士，往大了说也不过是些政治野心家、冒险家和阴谋家。

由于苏秦张仪这班人在历史上开创了成功范例，造成了巨大的历史动静，对后世的影响不可小觑，所以历代都不乏一些士林高士趋其后尘，如三国诸葛亮、明初牛鼻子道人姚广孝、清初汉家书生范文程。

某种程度上，“帝王术”及承载其主体思想的纵横家，已经构成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道潜伏的地下暗流。表面上看，这条长河似乎发源于儒、释、道三条干流，其实不然，干流之外另外却暗藏着很多细小的支流，其中法家就是最大的一支。所以中国文化才有“表儒里法”一说。而“帝王术”便是由法家这条支流直接衍生出来的一条旁系浊流。历史上某些年份，气候反常，阴阳失调，干流往往缺水，支流便大行其道，而浊流便乘虚而入。这便是乱世。

乱世出英雄狗熊，也出高士鬼才。

大凡操弄“帝王术”的，都懂得夜观天象，讲究“谋利之前先谋势”，一般都喜欢纷争乱世，因为唯有乱，才会鹿走中原引来争者，有争必有二，有二他们才能依违两端，审时度势，选择潜在成功者，乘其将起未起、欲强未强之时，投机下注，以奇谋妙计献之麾下，助其在争斗中一举胜出便大功告成。天下既定，人主自然要论功行赏，届时自己免不了要封侯拜相。可谓投资小收益大。

可见操弄“帝王术”并不简单。

一要选对人。英雄乎狗熊乎，有时差别不大，如何辩识便是大学问。

“帝王学”，简而言之便是物色、选择、拥戴、辅佐“非常之人”，设计并运用非常之谋略，助之成就帝王事业的学问。说是“学问”，其实无非教人押宝强梁，乘乱趋势，但问目的，不计手段。总之，阴谋于密室，逞强于时势，重术而轻德。

二要察清势。跟早了，形势不明，风险极大，很可能血本无归。跟晚了，大局已定，投资再大，也不受重视。

三要设好谋。没有好谋可献，委身麾下，人家顶多拿你当作蓝领人力，决不会视为金领人才。如此一来，选人察势，一切白搭。

看来，“帝王术”绝非一班文人所能操弄，唯高才奇士间或可以为之。

清末民初，适逢乱世，而王闿运又自恃高才，加之时运不济，仕途受阻，所以“帝王术”顺理成章跃入他的眼帘。从此，王闿运大名便与“帝王术”紧密联系在一起，误了自己，也误了高徒杨度。

王闿运几次会试不中之后，便留在京师，加入“北漂”一族，表面上与友人饮酒赋诗，作衣裳会，实际上是在窥探天下形势，下好金钩，欲钓英雄。

第一个被钓的便是咸丰朝权臣肃顺。此人身为满族权臣，政风虽猛，独断专行，却极爱天下英才，曾国藩早年，也因才获赏，被肃顺青眼相看过。

王闿运勾留京师与友人唱和之间，不经意间将自己“饱读经史，文采斐然”的才气和文名也传播了出去，弄得京师官场文坛无人不知，肃顺很是动心，竟欲俯身与王氏结为异姓兄弟，并表示愿意出资为其捐官。王氏虽然感动，但颇为矜持，嘴上说不愿由偏门进入官场，实质上口不应心，对肃顺渐生委身相托之意，不时为肃顺捉刀起草奏折。

据说，一日咸丰帝对某份奏折大加赞赏，忍不住询问肃顺：

“此件为何人起草？”

肃顺回答说是湖南举人王壬秋。咸丰帝说，为何不让此人做官？

肃顺回话：“此人非翰林不干。”

咸丰帝大笑说：“那就封他做翰林。”

此说是否真实，史无详考，但却足以说明王、肃政治上相互接近的事实。

只是形势不明，王闿运把握不准不愿及早下注，而宁愿周游于公卿文友之间，做野鹤闲云状，待在一旁静观形势。

果不其然，数年后咸丰帝病死，慈禧发动政变，第一个便诛杀了顾命

大臣肃顺。王闿运闻变，不胜悲怆，暗中作诗一首：

当年意气各无伦，顾我曾为丞相  
宾。俄罗酒味犹在口，几回梦哭春华新。

大有哭吊故人之意。

此后，王闿运虽然难忘故人，多次救济肃顺家人，但为避肃党嫌疑还是不得不远离京师，别处下钩去了。

不久，胡林翼、丁保祯、曾国藩等一班晚清封疆大员都先后受到王闿运的游说，特别是曾国藩，王更是寄望很深。

当时，曾国藩率湘军督师东南，与太平天国角力，渐成气候。王闿运见贼势日萎，东南乱局早晚平息，而曾国藩“奉旨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”，大权在握，正所谓：曹操模样，越瞧越像。于是便转而投奔曾氏，打算为其谋画天下，以图晋升之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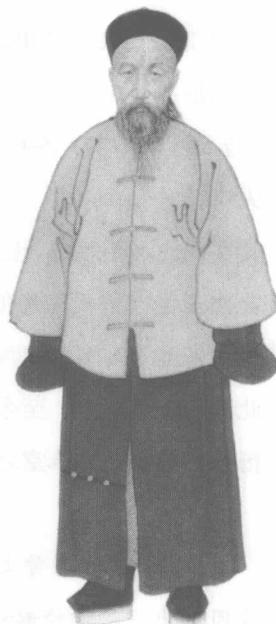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王曾二人由于同乡关系，彼此早在曾氏回乡办团练期间就有交往。据说咸丰八年，湘军三河新败之后，王氏还特地赶到曾国藩驻地，与曾氏“夜谈五日，至三更而难罢”，足见王曾二人早有交往。

晚清天下督抚三分之二，差不多都出自曾幕。足见曾国藩爱才惜才，知人善任，对人才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。

曾氏爱才几乎成癖，王氏才名海内皆知。

按说王氏此次上门求售必为曾氏所重用。

不料此次重逢，盘桓数月，宾主促膝深谈十余次，王闿运终因“未见曾国藩稍稍授以事权而任用之”怏怏而去。



王闿运寄予厚望的晚清封疆  
大吏曾国藩

如此高才名士，曾国藩居然弃之不用！原因何在？

一说王氏本人对此也曾百思不得要领，辗转托人探听原委，获悉曾国藩心思竟是：

“若人言语不实，军事一有挫失，渠必横生议论。与其后日失欢，不若此时失欢。”

其实此说恐不足信。曾国藩弃用王闿运的真正原因，在于私室密谈期间，王氏屡次三番向曾氏兜售他的“帝王学”，以一句“东南半壁无主，涤帅岂无意乎”来挑动曾国藩拥兵造反。

此说因过于敏感，至今未见于正史，但却频见于民间学人的著述之中。

杨钧在其著述《草堂之灵》中便录有一段王闿运自述：

湘绮云：尝与曾文正论事，其时曾坐案前，耳听王言，手执笔写。曾因事出室，湘绮起视所写为何，则满案皆‘谬’字。曾复入，湘绮论事如故，然已知曾不能用，无复入世心矣。

杨钧乃王氏高徒杨度之弟，较之前说，杨氏所记似更加可信。

台湾历史作家高阳先生也说：“王闿运一代文豪，但不甘于身后入《儒林传》或《文苑传》，他的为人，权奇自喜，知兵自负，以为可以助人成王成霸。这一路性格很配肃顺的胃口，所以奉之为上宾，但在谨饬自守的曾国藩，就决不敢用他。曾国藩延揽人才，唯恐不及，独对王闿运落落寡合。”

其实王氏所献“造反自为”的奇策，曾国藩之所以不予采纳，并非曾氏胆怯而不敢为，也非曾氏忠清而不愿为，实乃曾氏担心“洪杨之乱”后，国中再起刀兵内乱，恐为西方列强所乘而最终导致中华衣冠文物与国俱亡。曾氏这番心思，曾对自己最器重的幕僚赵烈文坦露无遗。

可见王氏见拒于曾氏，实在不能全怪曾国藩，而是王氏自己昧于天下大势，被怀中所抱的“帝王术”所误。当然，曾国藩不喜欢大言书生也是事实，

而王闿运却是晚清出了名的大言鬼，据说其字壬父，便是“文王”二字的倒写。

此番遭拒对王氏打击很大，从此如他所言“有了出世之心”，潜心为学，授艺课徒，开始了半隐居式的著述教学生活。

王氏一生，著述颇丰，大致分为杂记、经学和史学三类。杂记计有《湘绮楼日记》、《湘绮楼文集》等。经学著述数量最多，功力深厚，影响不小，钱锺书之父钱基博先生曾说：“一时言文章老宿者，首推湘潭王闿运。”不过后世重商轻儒，王的经学影响今日除了学术圈内若干学人之外，一般读者大概是不屑于知道的。史学著述着力于地方志，影响更加有限，唯有那本前前后后费时七年反复修撰的《湘军志》，因与曾国藩兄弟产生抵牾而名闻后世，也是此老一生引以为傲的资本。

1864年，当湘军踏破金陵高大的城墙，一举搬开洪秀全腐烂的尸身，将东南半壁牢牢握在掌中的时候，曾国藩不由得生起了“盛世修史”的贪念，决心请人入幕修撰一部《湘军志》，一来表彰湘军扫灭太平天国的“丰功伟绩”，抬高曾家兄弟的声望，以图光宗耀祖，名垂青史，二来也想借此杀杀后起之秀李鸿章淮军的威风。修史当然需要延请名家，这样，学富五车了解湘军的才子王闿运自然成了首选人物。所以，当曾国藩长子曾纪泽代表其父盛邀王闿运修撰《湘军志》时，时年42岁的王闿运觉得这是展露才学、以大清董狐面目载入史册的大好机会，便一口应承下来。

史料拔冗，民间采微。删减幕中，走访四野。一番功夫做足之后，这位湘中才子才发现，湘军兄弟远非曾氏左右所言的那般“光明昭昭”，相反“烧杀劫掠，强奸民女，杀虐无辜”一时“竟似匪类”，至于败绩更是昭彰得很，以致曾大帅几次投水，差点功亏半道。

对于湘军这段历史，自己是秉笔直书，还是为尊者讳？一番挣扎后，王闿运决心坚持史家的良心，直言不讳。

然而，当他按此思路端出《湘军志》大纲呈报曾国藩时，曾氏阅后面沉似水，一双三角眼上上下下将他刺了个透心凉：

“先生，能为老朽及三湘子弟避讳否？”言罢，曾氏命人端来一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放在王闿运面前。

“曾帅当世人望，集事功学问道德于一身，岂不闻秉笔直书，乃史家数千年之传统？曲笔写史，实非晚生所能为也。”一番对答之后，王闿运留书一封，悄然遁去。

数年后，王闿运仗着才华，根据所掌握的史料终于秘密写出了历史真相版的《湘军志》。尽管王氏在书中对曾国藩多有推崇，于湘军战绩也多有褒奖，但毕竟直抒胸臆，笔带锋芒，揭开了很多不为人知的黑幕。因此刻印刊行后即遭湘军将领的怒骂，特别是那位杀人不眨眼的曾国荃看后更是暴跳如雷，骂声不绝：

“此等匹夫，乃吾辈熟客，居然如此胡说八道！”扬言要杀王闿运以泄心头之恨。

头顶巨石般的压力，王闿运感叹“直笔非私家所宜为”，最后不得不将原版交郭嵩焘毁掉，才算平息了众怒。

好在此老留有余地，私下暗藏了一卷底稿，待风声平息后，于毁版次年重校后，又在四川再版刊行，最后逼得曾国荃直跳脚，只好另请幕僚王定安另撰《湘军志》，试图抵消它的影响。

重刻之日，王氏坦言：“此书信奇作，实亦多所伤，有取祸之道，众人喧哗宜矣。”

似乎“众人喧哗”乃其意料中事，看来王氏从未打算笔下徇情。

可见弃术为学的他，保持了一个文章家的良知和操守。因此，后世有学者称王氏《湘军志》“文笔高朗，为我国近千年来的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”，“是非之公，推唐后良史第一”。

本来远离庙堂“相忘于江湖”，余生已无兴趣掀起波澜了。尽管清亡前三年，此老还被清廷请入翰林苑，先后授予翰林检讨、翰林侍讲二职，但因其时科举已废，留学归来之士，但有所成，则无论出身均可享此名号，

赐予进士出身，乃至有“牙科翰林、染织进士”之谓。所以此老也知道，这些不值钱的虚衔不过是清廷给他聊慰晚年罢了。

孰料，又出来一个杨度，定要将他抬上民国政治舞台替他自家导演的“洪宪闹剧”跑一回龙套，差点又将此老送回“帝王术”的幻梦中去。好在此老年逾八十，阅尽万人，观人察势的本领实在非同常人。所以对于杨度“思依我以立名”的想法，身为人师的他倒是不吝借名以助，但若真要他下水，他却一退千里，保持着一个智者的清醒。此时的王闿运更愿做个文章家，而非纵横家，尽管更多的时候他和章太炎一样，喜欢世人将他看作是政治家而非文章家。

相对于著述而言，王闿运在课艺授徒方面似乎成就更大。有道是“师名立于弟子”，王闿运自身才学卓绝，经史俱佳，加之纵横捭阖，交游权贵，不靠弟子原本就名满天下，但其所教的几个弟子后来的确给他增色不少，譬如经学大师廖平（康有为是其嫡传弟子，梁启超为其再传弟子），国画大师齐白石，民国政客夏寿田（历任民国元年湖北省民政长、袁世凯总统府内史、曹琨机要秘书）、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和刘光第、同盟会元老刘揆一，无一凡角。

但若论起师徒二人亲近程度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，则谁也比不上杨度。特别是在王门绝学“帝王术”方面，杨度更是独获真传。

本来严格意义上讲，民国之于王闿运犹如鸿影留潭，转瞬即逝，但王闿运之于民国却似金边攘袖，格外晃眼。尽管这道金边非王氏自己亲攘，而是假其弟子杨度之手。

杨度，湖南湘潭人，生于1875年，卒于1931年，行世仅五十余年，却先后鼓吹立宪、为孙中山而奔走，死前又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。可



北洋时代最具争议的人物——杨度（1875—1931）。纵观杨度一生，不禁让人感叹：成也帝王术，败也帝王术。

以说，一生数易阵营，立场迥异，因而格外引人注目，成为北洋时代最具争议的人物。

民国是一段险滩密布、百舸争锋的激流，杨度便是这激流上弃船换舟最频繁的水手。

不过杨度划水的本领，源于王闿运。

杨家祖上世代务农，祖父杨礼堂率杨度伯父投身湘军，后战死三河，伯父杨瑞生死里逃生，后因军功升为总兵，家境才略有好转。十岁时，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的父亲不幸谢世，杨度便被过继到伯父门下。

杨度自幼聪慧好学，闻名四乡，为当时执教船山书院的王闿运所获悉。1888年，王闿运亲到杨家招其为学生。杨度师从王闿运之后，于经、史、子、集颇为用心，经常有独特见解，使王也为之惊异，因而深受王闿运喜爱，师徒关系日益密切。后来其妹杨庄也投师门下，及长竟换身份，成为老师王闿运的儿媳妇。

杨王两家，由师生渊源而缔结婚姻，不能不说与王闿运对杨度的喜爱大有干系。

王闿运对杨度的喜爱，到了随便开玩笑的程度，在《湘绮楼日记》中，王氏就多次戏称杨度为“杨贤子”。

这种情感，也是王闿运晚年甘心为弟子杨度跑龙套的原因之一。

杨度在王门学了三年，于老师学问库里十八般兵器当中，偏偏相中“帝王术”这门神秘暗器，从此醉心此术不知觉醒，对他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曾与友人说：“余诚不足为帝王师，然有王者起，必来取法，道或然与？”

出师后，杨度迷恋上了新学，适逢湖南新政，谭嗣同、唐才常、梁启超等新派人物在长沙办时务学堂，于是杨度便与蔡锷、刘揆一等人一起听课、讨论国事。由此杨度的大名便与维新派挂上号。

1902年，杨度不顾老师王闿运的反对，自费留学日本，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，与黄克强同学。受留日学生影响，思想日趋激进，和湖南